

The Digital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Role Re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s

Xia Deyuan

Abstract: Data is the material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s the basis of knowledge; knowledge is the cognitive results of the processing and extraction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ince data is the basic material of information and the source and basis of all knowledge, data has the attribute of resource. In the information era, data is as important as land in the agricultural era, or ore and resource in the industrial era; Those who control data control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knowledge.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is never a pure problem of technology, but a problem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as well. It is people's aspiration for knowledge, instead of technology, tha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storage and dissemination technology. It is the political confinement and economic restriction, instead of technology itself, that makes it difficult to popularize and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technology. After dissemination technology breaks through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trictions makes progress, and then increasingly meets people's aspiration for knowledge, more needs for dissemination is further induced. In this sense, it is the paradoxical movement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knowledge tha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brings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digitalization dissemination not only motivates people's potential needs for knowledge consumption but also hastens the new knowledge production patter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 The rights which human beings have upon knowledge are transferred actively on a large scale: The influence and voice on the previously acquired knowledge is being transferre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radually. As human intelligence is restricted by body to the ceil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overcome all the restrictions of human body and thus maximize the intelligence belonging to human beings. Such a change unquestionably has subversive influence: It will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human knowledge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sharing in all dimensions, change the patter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oroughly renew all human notions about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fter the gradual popularity of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general public possess unprecedented abiliti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which would makea certain impact on the inherent advantages of intellectuals, and bring about crisis to their identity as experts. I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refuse to be repl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they have to keep a civilian standpoint and consciousness of knowledge critique, and take more moral obligation for the knowledge benefit and knowledge sovereignty for the public.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of knowledge, digital knowledge, knowledge monopoly, intellectuals' mission

Author: Xia Deyuan, received the bachelor degree of law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1984, the doctor degree of journalism at Fudan University in 2011, taught and worked successively at The Second Middle School Attached to Fudan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held the posts of editor-in-chief and president at Shanghai Education Audio-Video Press. He is now the professor and senior editor at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Art Design i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or of Internet and Cultural-and-Creative-Industry Coordination and Innovation Center, and the vice-chairman of Shanghai Folk Culture Association and the researcher of The State innovative institute for the Studies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ociety at Fudan University. Xia mainly conducts the research on New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The Rise of Cyber-Mediators: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nd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and Media, Research of Digital 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xiety of Communication*.

南國學術
前沿聚焦

知識的數字化傳播與知識分子的角色重構

夏德元



[摘要] 數據是信息的材料，信息是知識的基礎，知識是對數據、信息的加工和提煉後形成的認識成果。由於數據是信息的基本材料，是一切知識的來源和基礎，因此，數據具有資源的屬性；在信息時代，數據的重要性好比農業時代的土地、工業時代的礦石和能源，誰控制了它，誰就控制了信息的傳播和知識的生產與消費。知識的傳播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它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是人們對知識的渴求推動了知識存儲、傳播技術的發展，而不是技術決定傳播；是政治的禁錮和經濟的制約，使傳播技術的普及和推廣變得困難，而不是技術本身。當傳播技術

衝破政治、經濟、社會制約獲得發展進步，並且越來越多地滿足人們對知識的渴求之後，又必然會反過來進一步誘發人們更多的傳播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知識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運動，推動了知識傳播的發展，也帶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知識數字化傳播的迅猛發展，不僅激發了人們的潛在知識消費需求，也催生了“用戶創造內容”的知識生產新範式，人類對知識的權利正在作主動的大規模讓渡——將過去所掌握的知識的影響力和發言權，逐步讓渡給了人工智能。當人類的智能受限於人的身體而再難提高時，人工智能却可以克服人身的諸多限制而將屬人的智能發揮到極致。這樣的轉變無疑具有顛覆性的影響，它將全方位地改變人類的知識生產傳播共享格局，極大地改變社會組織方式和人際交往方式，徹底更新人們有關知識傳播的一切觀念。由於普通民衆在移動傳播技術日益普及後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知識生產和傳播能力，這對知識分子的固有優勢地位也造成了衝擊，從而使其專家身份出現了危機。傳統知識分子如果不想被人工智能機器所取代，就必須在新的社會形態中保持一種平民立場和知識批判的自覺，在為民衆爭取知識福利和知識主權時承擔更多的道義責任。

[關鍵詞] 知識數字化 數字化知識 知識壟斷 知識分子的使命

[作者簡介] 夏德元，1984年在華中師範大學獲得法學學士學位，2011年在復旦大學獲新聞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或工作於復旦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復旦大學出版社，曾擔任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總編輯、社長等職務；現為上海理工大學出版印刷與藝術設計學院教授、編審，互聯網與文化創意產業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民俗文化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研究員；主要從事新媒體、傳播學研究，代表著作有《電子媒介人的崛起——社會的媒介化及人與媒介關係的嬗變》《數字出版與傳播研究》《傳播的焦慮》《突發公共事件與微博治理研究》（合著）等。

儘管直到三四百年前，英國近代經驗主義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 Bacon, 1561—1626）纔明確喊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但是，人類之所以能從動物界脫穎而出，並發展出高度文明的社會，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注重積累傳承文化知識，無疑是極其重要的因素。人類文明進化史上，出現過幾次大的飛躍，每次飛躍都伴隨着知識的大爆炸；而以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發明為標誌，人類社會則進入了一個“知識經濟”時代或從整體上可以名之為“信息時代”。在這樣的時代，知識，尤其是數字化的可以通過互聯網傳播運用的知識，變得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相應地，知識的生產和消費也呈現出過去時代未曾見過的別樣風景，普通民眾、傳統知識分子以及資本的力量對比和權利格局也發生了重大變遷。如何正確認識數據、信息、知識的關係？是什麼力量推動了知識傳播的爆炸式增長？知識的數字化傳播給人類社會生產生活和交往實踐產生何種影響？數字資本的崛起及其對數據和知識的壟斷將帶來怎樣的後果？傳統知識分子在新的時代遇到了怎樣的身份危機，又該如何尋找出路？這些問題都是值得認真探討的。

一 究竟是“數字知識傳播”還是“知識的數字化傳播”？

在討論數字知識傳播之前，有必要清晰界定“數據”“信息”“知識”等範疇，並嚴格區分“知識的數字化”和“數字化的知識”等概念；否則，既不利於學術界對相關問題的認識，也有礙知識數字化傳播的實踐展開。

要搞清楚與數字知識傳播有關的問題，必須對相關的核心概念做一番梳理。這些概念包括彼此關聯的三個範疇：數據、信息和知識。

在對“知識”概念的認識上，人們普遍認為“知識是一種認識成果”，分歧主要來自對“成果”的不同闡釋。構成“認識成果”的必要條件，是認識的正確性和價值性。換言之，知識是一種正確且具有價值的認識。^①

“信息”這個概念，至少有三種類型的定義。“從本體論的意義上說，它是事物運動的狀態和（狀態改變的）方式；從認識論的意義上說，它是認識主體所感受或所表述的事物運動的狀態和方式。”^②第三種定義是從通信工程的角度界定的。信息論的創始人香農（C. E. Shannon, 1916—2001）把信息定義為“兩次不確定性之差”，認為信息是對“不確定性的消除”。^③

關於“數據”的定義，也有不同的層次。狹義的“數據”，是指數據庫中存儲事物的數字化呈現形式或對事物的數字化、標準化的描述；它在計算機系統裏，通常是用一連串的數字來代替。所謂“事物的數字化呈現”，即對文字、聲音、圖像等進行數碼處理後所形成的數據；這樣的數據，通過數字解碼，幾乎可以完全加以複製和還原。所謂“對事物的數字化、標準化描述”，即對人和其他複雜事物的某些特徵所做的數字化的描述；這樣的數據，有利於對複雜事物進行分析、綜合，並借此進行管理。稍微廣義的“數據”，通常是指科學實驗、檢驗、統計等所獲得的和用於科學研究、技術設計、查證、決策等的數值，也指存儲在某種介質上能够識別的物理符號。再廣義一些的“數據”，包括一切事物的數字化呈現及其特徵乃至事物全體的數字化的描述。什麼可以成為數據，就看其是否可以做數字化的再現或描述。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們能掌握的數據會隨着數字化技術的提高而日益增加。

“數據”“信息”“知識”三者之間，大致是外延逐步縮小，內涵漸次豐富的關係。具體而言，“知識”是有價值的正確認識，“信息”是事物屬性的反映，“數據”是事物特徵或狀態的描述。知識是人類的認識結果，信息是人們所能接受到的事物的特徵，數據是被數字化的事物的

^① 何振華：“知識與信息的定義及其關係新探”，《圖書情報工作》10（2003）：44-49。

^② 鍾義信：《信息科學原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第4頁。

^③ [美]布爾金：《信息論：本質·多樣性·統一》（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王恒君、嵇立安、王宏勇譯，第64頁。

狀態。數據是信息的材料，信息是知識的基礎，知識是對數據、信息的加工和提煉後所形成的認識成果。由於數據是信息的基本材料，是一切知識的來源和基礎，因此，數據具有資源的屬性；在信息時代，數據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如同農業時代的土地、工業時代的礦石和能源，誰控制了它，誰就控制了信息的傳播和知識的生產與消費。

知識傳播是個古老的話題，數字知識傳播則是數字化時代的新話題，沒有數字化技術的誕生，就沒有知識的數字化，也就談不上數字知識的傳播了。而一旦人類的所有知識都數字化完了，數字知識的傳播又等同於知識傳播了。

與此相關的一個命題是——知識的數字化傳播。雖然自電報技術和電報編碼誕生以來，人類就步入了數字化傳播時代，但是到今天為止，人類社會數千年來所積累的知識，仍然沒有完全數字化。所以，知識的數字化傳播還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關於知識的傳播，人們今天仍然面臨着這樣兩個問題：“知識的數字化傳播”和“數字知識的傳播”。知識的數字化傳播是一個策略問題，即應該考量哪些知識需要、適合數字化傳播，以及何時、何地、何人進行數字化傳播；數字知識的傳播，則是一個工程問題，重點應關注的是數字知識傳播效率問題。

當然，這兩種傳播也有相通之處，即都需考慮傳播的內容、主體、受體、渠道等問題。不僅如此，還應該正視知識傳播的倫理視角。美國科學家最新研究表明，人的認知能力與道德判斷是密不可分的，換言之，知識並不能撇開倫理因素而獨自傳播。根據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林垚的譯介：“心理學的傳統觀點認為，人類的認知能力與道德能力是相互獨立的兩個功能。認知是在描述層面上對現象的觀察、歸納、分析、解釋，而道德則在規範層面進行善惡褒貶的判斷。認知是認知，道德是道德，認知能力本質上與道德無關；具體的認知過程也許會遭到道德判斷的少量‘污染’，但若想達到‘純粹’的認知，就必須把道德對其的干擾排除出去——這一傳統觀點近年來遭到了‘實驗哲學’運動領軍人物、耶魯大學教授約叔華·諾布（Joshua Knobe）為首的挑戰。諾布等人的實驗顯示，道德判斷不僅不是對‘純粹認知’的污染，反而是人類認知能力的內在組成部分，是認知功能正常運行的關鍵環節。”^①

總而言之，當今時代，人們在考慮知識傳播問題時，必須首先搞清楚既有知識的數字化和數字化的知識之間的差異，否則思維會陷入混亂，很難把握問題的根本，更不利於知識服務實踐探索的展開；近年來，出版行業在數字化知識服務領域的踟躕不前或夜郎自大，多少與這樣的模糊認識有關。同時，還應將倫理問題納入知識傳播研究的視野。

二 知識的數字化傳播爆發式增長的內在動力

知識的傳播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乃至包含着倫理問題）：是人們對知識的渴求推動了知識存儲、傳播技術的發展，而不是技術決定傳播；是政治的禁錮和經濟的制約，使傳播技術的普及和推廣變得困難，而不是技術本身。當傳播技術衝破政治、經濟、社會制約獲得發展進步，在越來越多地滿足了人們對知識的渴望之後，又必然會反過來進一步誘發人們更多的傳播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知識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運動，推動了知識傳播的發展，從而也帶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當然，這種進步不是直線式前進，而是螺旋式上升的。在漫長的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知識的生產、傳播格局經歷了幾次大的變遷。在原始社會，集體勞動和平均分配要求每個部落成員都能平等地參與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活動。隨着社會分工的出現和階層分化，男人、女人在知識生產和傳播中的角色開始分化，不同階層在知識傳播格局中的地位也開始有了分別。久而久之，統治

^① Joshua Knobe, “Person as Scientist, Person as Moralist”,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 (2010) : 315-329.

階層逐漸壟斷了知識的生產和傳播，一部分人淪為另一部分人的傳播對象乃至使喚的工具，他們沒有知識生產和共享的權利。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壯大，改變了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格局，尤其是印刷術的普及以及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的誕生，使得知識生產成為更多人的權利，也使知識的傳播更加廣泛而自由。但是，此時的所謂大眾傳播媒體，事實上仍然為強權集團和大資本家所控制，其傳播祇能勉強算作“對大眾的傳播”；祇有到了互聯網時代，聯網計算機數量的爆發式增長，尤其是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纔使得“大眾參與的傳播”成為可能。^①

網絡技術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和普及，對應着知識數字化和數字知識傳播的迅猛發展，但這並不意味着知識的數字化傳播爆炸式增長的動力來自技術進步；恰恰相反，雖然技術從來都是一種革命的力量，但技術同樣可以用來鉗制革命。換言之，知識的數字化傳播的爆炸式增長，儘管離不開技術的突飛猛進，更為關鍵的原因還在於，人們對知識永不匱乏的渴求。收集數據、整理信息、積累和分享知識，是人為了積極適應環境並有效地與周圍環境進行信息交換、能量轉換而不斷得到強化的傳播天性；正是這樣的傳播天性，纔是知識數字化傳播的原初動力。雖然技術對人的解放往往受制於制度因素、經濟條件而無法徹底，但人們對知識消費的先天迷戀，總會衝破種種限制而帶來傳播的一次又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正如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指出的：“數碼網絡技術問世二十年後，出現了一種新的電子書寫形式，絕對會影響到一切個體和集體行為，借助於持續不斷的鏈接，最終可生產出世間的一切。數碼技術是一味藥，所有證據表明，數碼技術可以承載起另一種社會，一種不再建基於福特制和消費主義至上，而是以‘貢獻型經濟’（economy of contribution）為基礎的新型社會。”^②

人類曾經經歷過知識生產與傳播的原始共產主義時代，後因階級分化而導致知識生產與分享權利的不平等。一小部分人壟斷了知識生產和分享的特權，而廣大民衆却淪為知識的赤貧。猶如乾涸的大地更易容納雨水也最容易形成洪災一樣，人們今天所見證的知識的數字化傳播的爆炸式增長和某些亂象，正是源於民衆對傳播權利的失而復得的驚喜和狂歡。瞭解了這一點，人們就不應完全寄希望於單純的技術革新，而是在技術創新的同時，也不放棄在社會制度、文化體制方面的努力。

三 知識數字化傳播的發展催生知識生產新範式

歷史形成的有關知識傳播的法律制度，包括知識產權制度，並不一定是最合理的制度。斯坦福大學教授萊姆利（Mark A. Lemley）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律評論》（UCLA Law Review）撰文，對“知識產權信仰論”進行了批判式辨析。他指出：“傳統上，保護知識產權的理由都帶着功利性。賦予知識產權權利人排他性權利，是因為我們相信這終會增益於世界。但是，我們所掌握的實證資料，却不能充分證明當下知識產權制度的合理性。”許多學者認為“知識產權的合理性在於其本身的道德目的，而非其對世界的影響”，萊姆利却堅持認為“這些道德性依據，最終會被證明其非但不具備說服力，而且還是理性社會的一次倒退”。^③

知識數字化傳播的迅猛發展，不僅激發了人們的潛在知識消費需求，也催生了“用戶創造內容”的知識生產新範式。

在“前數字化”傳播時代，民衆祇能享受到分享知識的部分福利，並需承擔接受訓誡和教化的繁重義務。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勞動者以出賣勞動獲取生活資料，所獲得的報酬祇够維持自身生命的簡單再生產，所接受的科學和社會知識以及勞動技能祇不過是謀生的手段而已；在整個社會生產系統中，勞動者所享有的傳播權利極其有限。隨着勞動者自主意識的覺醒和不懈鬥爭，

① 夏德元：“民衆傳播的興起與微博文化的若干思考”，《東吳學術》1 (2012):16-25。

② Bernard Stiegler, “Digital as Bearer of Another Societ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view* 1 (2011) .

③ Mark A. Lemley, “Faith-BasedIntellectual Property”, *UCLA Law Review* 62 (2015) : 1328-1344.

借助技術的解放力量，勞動者在整個傳播格局中的地位逐漸得到改觀；他們不僅獲得了更多的閒暇時間用於自我修復之外的知識分享和精神歷險，還可以有條件地參與知識生產。

正如人們曾經經歷過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面向大眾的傳播媒介，為普通勞動者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生產和傳播知識的機會，使得傳播主體地位逐漸向普通民衆回歸。換言之，儘管大眾傳播媒介一度被權力和資本所控制，在其逐漸向普通民衆開放的過程中也屢屢受限，但畢竟是借助資本的解放力量，大眾傳播媒介上的普通人的形象、普通人的聲音、普通人的文字越來越多了。

進入互聯網時代後，仍然是借助資本的解放力量，在大眾傳播媒介之外，又誕生了無數由民衆個體自己維護的自媒體；自媒體的誕生和迅猛發展，使得民衆生產知識、傳播知識、分享知識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噴涌而出，蔚為大觀。

“知識產權是政府對市場進行規制的結果，這並不意味着它是壞事。許多法規都是良法，知識產權的部分權利也是如此，但這種政府對市場監管之結果的確意味着它生來並非好事。”^①過去的知識生產和傳播往往與經濟回報相聯繫，不以盈利為目的的知識生產是難以想象的；現在，在知識生產領域，開放存取、協同編輯、“非營利版權”（Copyleft）、免費共享等新的技術和新的觀念層出不窮，固有的知識產權概念也面臨新的挑戰。根據學者對“知乎網”以“弱關係”為基礎的知識傳播機制所進行的考察，該平臺上“用戶獲取和貢獻的知識是多元化的，並且更多的是跨學科的知識”，“用戶的自我效能、利他心理、成員感知的樂趣、工作時間等，與知識貢獻的程度呈現顯著的相關關係。並且，獎賞激勵制度的缺失，對成員的知識貢獻並沒有呈現負面影響”。^②由此可見，一種全新的知識生產與知識分享范式正在形成。

過去，知識的生產由權威機構和社會精英壟斷，知識的傳播則由主流媒體管控；現在，這樣的格局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知識的數字化傳播技術的發展進步，帶來了生產成本和傳播成本的持續降低；民衆傳播的興起^③，又帶來了知識生產和消費觀念的革命以及文體的革命，他們比過去的精英人物更會生產也更會欣賞，從而誕生了一個又一個新的語言表達方式和文本呈現方式。諸如超文本鏈接、解構、戲仿、圖像化、漫畫化、遊戲化、多媒體呈現、虛擬呈現、增強現實等等，無不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其顛覆性創新所帶來的知識傳播範式的革命，也令人充滿期待。

四 知識的數字化傳播對未來社會的顛覆性影響

知識的數字化及其傳播，不僅催生了新的知識生產方式，也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的改變。

2016年4月，《人類簡史》《未來簡史》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 Harari）到中國做了多場演講和對話。在這一系列演講和對話中，他天才般地展示了知識數字化傳承所能開啓的充滿想象的未來。他說：“人類將失去其在世界的主導地位，權威和權力將讓位給算法和數據處理系統，一切都是數據流，數據取代以往的宗教成為人們的最新信仰。”他認為，與“人文主義相信感覺和人類的自由意志”不同，“科學正在告訴我們”既沒有什麼“自由意志”，所謂情感也祇是一種“生化過程”，“祇要給予足夠的數據和計算能力，一個外部實體可以比我們更瞭解我們自己，可以為我們做出更好的決策”。^④在與“獵豹移動”首席執行官傅盛的對話中，赫拉利還認為：“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從工業時代繼承下來的信息和遺產都慢慢不重要了。”“我們正處在兩大科學的交匯之中：人文和計算，馬上要出現一個海嘯了。一邊是生物學家掀起的巨浪，開始

① Mark A. Lemley, “Faith-Bas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UCLA Law Review* 62 (2015): 1328-1344.

② 寧菁菁：“基於‘弱關係理論’的知識問答社區知識傳播研究——以知乎網為例”，《新聞知識》2 (2014) : 98-99, 50.

③ 夏德元：“民衆傳播的興起與微博文化的若干思考”，《東吳學術》1 (2012): 16-25。

④ “尤瓦爾·赫拉利：從認知革命、商業的基因到數據崇拜和智能之心”，《鳳凰國際智庫》，2016-04-25。http://pit.ifeng.com/a/20160425/48577940_0.shtml.

真正瞭解身體；一邊是計算科學掀起的巨浪，也就是達爾文遇見圖靈。”^①同年8月26日，他又在《金融時報》撰文指出：“就像宗教神話賦予神權合法性，人文主義思想體系賦予人權合法性，高科技大師和硅谷預言家們正在創造一種新的全球性敘事，將算法和大數據的權威合法化。這一新穎的信條可以被稱為‘數據主義’。在極端形式下，數據主義世界觀的倡導者們將整個世界視作一股數據流，將高潮幾乎等同於某些生物化學算法，相信人類的宇宙使命乃是創建一個包羅萬象的數據處理系統，然後融入其中。”^②

赫拉利所描述的數字知識未來，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是近在眼前的現實。不管人們是否樂意，自我的身體以及身邊的一切都在日益被數字化，從基因解碼到基因編輯，從人工智能到情感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已經無孔不入，無遠弗屆。人類對知識的權利正在作主動的大規模讓渡——將過去所掌握的知識的影響力和發言權，逐步讓渡給了人工智能。當人類的智能受限於人的身體而再難提高時，人工智能却可以克服人身的諸多限制而將屬人的智能發揮到極致。這是一種革命性的轉變。這樣的轉變無疑具有顛覆性的影響，它將全方位地改變人類的知識生產傳播共享格局，極大地改變社會組織方式和人際交往方式，徹底更新人們有關知識傳播的一切觀念。

知識數字化所帶來的改變，並不祇是人類物質生產、精神生產、社會關係再生產和人與自然關係的再生產，知識的數字化傳播還將帶來人類自身再生產方式的革命，“很多科學家和學者認為，我們會超越有機體，然後升級到計算機，生命的基礎從碳水化合物到硅物質，這個時候人類就可以更容易地離開地球……”^③知識數字化傳播的迅猛發展，也並不祇是帶來福利，它還會如高速行駛的列車給靜止的人體帶來眩暈一樣，給尚處於前互聯網時代的人類身心導致某種不適。進入互聯網時代後，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普及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知識的數字化，以及由此帶來的信息充盈，使得信息的層次性、複雜性被豐富性所取代。換言之，信息的大量湧現，擠走了複雜性得以展開乃至存在的空間，世界日益被強大的信息流沖平，好比洪水的沖刷使得地表日益趨於平坦一樣。

平坦的大地有利於墾殖，但是却往往犧牲了生物多樣性。信息流所造成的後果與此類似。在信息洪流的裹挾下，日漸蔓延的傳播焦慮症^④使得信息接受者產生一種複雜性厭惡，即對複雜信息的耐受力降低，或者過敏；人們變得越來越不願意在複雜、燒腦的知識上花費時間和精力。在新聞領域，圖像化、可視化信息更易傳播；在文學消費上，人們更容易被扁平化人物形象所吸引；大眾對繪畫作品的欣賞趣味也趨於漫畫化、抽象化。正如社會學家潘綏銘所指出的：“目前對於大數據已經出現了盲目崇拜，‘一切皆可量化’是其核心口號和基本理論。但是在量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四種情況：剪裁現實生活、忽視社會情境、抹煞主體建構、取消生活意義。這種‘原罪’並不能由於數據規模的無限增大而被消除……大數據祇有對其‘原罪’進行深刻反思，並且予以充分展示，纔有資格在人文社會研究中保留一席之地。”^⑤

五 數字傳播時代的數據壟斷與知識分子的角色重構

當智能機器在越來越多的生活領域取代過去知識分子的位置時，人們不得不嚴肅思考知識分子的獨特價值——過去人們將那些徒有知識而缺乏人情味的知識分子稱作“兩腳書櫥”，而今或許要被喚作“人形機器”了。如果不想被人工智能機器所取代，知識分子必須在新的社會形態中進行角色重構。

① “《人類簡史》作者解碼認知革命、商業基因、數據崇拜”，《商業評論雜志》（微信公衆號），2016-05-03。

② Yuval Noah Harari：“《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大數據將是人類自由意志的終結”，《澎湃新聞》，2016-09-02，賈敏譯。

③ 尤瓦爾·赫拉利：“3場2萬字《人類簡史》作者中國行演講全記錄”，《黑馬網》，2016-04-29。<http://www.iheima.com/top/2016/0429/155488.shtml>

④ 夏德元：《傳播的焦慮》（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6）。

⑤ 潘綏銘：“生活是如何被篡改為數據的？——大數據套用到研究人類的‘原罪’”，《新視野》3（2016）：32—35。

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 (I. M. A. F. X. Comte, 1798—1857) 認為，知識是為了預見，預見是為了權力。^①知識的主要功能是掌握規律。如果不能掌握規律，也就談不上預測和控制。可是，正當科學技術大行其道的時候，它也越來越背離人們的初衷而走向目的的反面。站在人類總體角度看，不僅知識越來越不受控制，而且因其權威性還反過來控制人類。換言之，知識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由把握事物規律、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異化為控制人、統治人的工具了。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所謂數據挖掘、大數據技術等，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無不增加了個人的安全風險。站在人類不同個體角度看，知識為一部分社會成員所掌控，某種程度上已經形成對其他社會成員的壓迫和鉗制。

互聯網領域資本壟斷和技術霸權的日趨嚴重，帶來了與互聯網去中心化趨勢背道而馳的“再中心化”，不僅用戶的網絡足跡已被網絡巨頭全部掌控，用戶基於網絡平臺所創造的精神成果也被巨頭們攫取，或以任何理由隨意刪除或永久隱匿。因此，一些網絡用戶開始驚呼“互聯網已經死亡”。^②在資本和技術說了算的知識的數字化傳播時代，雖然民衆也獲得了更多的知識福利，但是，所有那些可以決定人們生存發展、生命安危的大數據和關鍵數據，仍然掌握在權力機構和大資本手中；這種知識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會導致一些弱勢人群因盲信網絡信息或因隱私信息被泄露而遭受損失。對此，《數字資本主義》一書作者丹·席勒 (Dan Schiller) 指出：“大數據的確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也提出更為深遠的問題。一方面，它會賦予那些靠信息獲利的壟斷資本更大的權力；另一方面，其他人却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剝奪掉一部分權力。這會造成更大的權力落差，預計將來會成為一個政治問題。”^③如何趨利避害，保障民衆與權力機構和壟斷資本獲取數據時的公平機會，實現信息的充分自由流通，並進而讓知識造福人類，仍然是擺在人們面前的嚴峻課題。

在中國，知識分子長期養成的憂國憂民情懷向來是與政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中國古代儒家知識分子尊崇的信條，曾激勵着歷代文人積極投身於現實生活中。從巴金 (1904—2005) 所推崇的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到近年來崛起的所謂媒介知識分子，都體現了一種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但是，由於一些知識分子被權力、勢力包圍日久，逐漸喪失了應有的操守，“‘知識分子的黃昏’這一曾在西方後現代思潮中出現的針對知識分子的失望心態”也開始在我們身邊蔓延。^④於今網絡上對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和將大眾媒體中出鏡的專家學者一概打上“磚家”標簽的現象，無疑是傳統知識分子身份危機的重要標誌。

網絡（新媒體）的興起，帶來了知識場域“二元”範疇融合的契機，促成了網絡“公共空間”的形成，影響着社會輿論。但網絡這個“無形學院”出現以後，知識的交流狀況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觀。網絡公共空間的改觀，有待知識分子更加珍惜和維護作為“文化監護人”的責任意識，拓展網絡空間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提升知識分子的價值和意義。^⑤

什麼樣的知識分子纔是合格的知識分子呢？中外學者對此都有深入的思考。美國哲學家雅各比 (Russell Jacoby) 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提出了他理想中的“公共知識分子”形象：“真正的知識分子應當立足專業，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創作參與社會運轉。”“應警惕知識分子成為一種私欲膨脹、專權專斷的群體。倡導知識分子瞭解和再現民衆意願，而不是打着民衆代

① [法]孔德：“實證哲學教程”，《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第26頁。

② 霍炬：“互聯網完蛋了，已經”，《歪理邪說》（微信公衆號），2017-08-03。<https://mp.weixin.qq.com/s/w8h0XrPugrPu3ynZP55uXw>

③ 王建峰：“告別信息崇拜 解構數字資本主義——訪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教授丹·席勒”，《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01-19。

④ 胡愛玲：“從知識分子的身份流變看當代知識分子的角色地位”，《求索》1 (2011) : 122—124。

⑤ 徐國源：“網絡公共空間與知識分子價值重構”，《新聞大學》5 (2015) : 8—12。

言人的名義祇為自身謀取權力和利益。”^①中國學者楊照則將“知識分子”定義為“以知識力量介入社會，影響社會的人”，一是他要“介入社會”，不能祇是在書房裏追求自己的知識精進而已；二是他介入社會的方式靠他的專業知識，而非其他。也就是說，擁有知識，意味着擁有了較為廣闊的文明比較資源，可以用來比對、反思、批判社會，幫助社會發現缺點，檢討錯誤。^②

在信息時代，知識如同武俠小說中所說的“武功”，是一種超出常人的特殊權力，因此，掌握知識者應學會像善用功夫一樣善用知識；同時，在民衆對抗知識數字化傳播時代新一輪知識壟斷的進程中，知識分子更應該有一種平民立場和知識批判的自覺，在為民衆爭取知識福利和知識主權時，承擔更多的道義責任。祇有這樣，纔能重拾文化人的尊嚴，也纔配得上“知識分子”的美稱。

[編者註：該文是作者承擔的中國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數據資產視角下出版大數據的構建與應用模式研究”（16BXW031）、上海市新聞出版專項資金項目“辭書數字化出版戰略與實踐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並得到了上海理工大學出版印刷與藝術設計學院張博和上海科學技術文献出版社梅雪林等學者的幫助，特作說明。]

① 趙建國：“‘公共知識分子’與媒介知識分子”，《新聞界》1（2007）：45—46。

② 楊照：“社會需要真正的知識分子”，《農村工作通訊》12（2012）：37。

·學術微信·

2017年11月24—26日，由湖北省倫理學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湖南師範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雜誌社、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聯合舉辦的“以《人本倫理學》為線索的理論倫理學研討會”在湖北省武漢市荷田大酒店舉行，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漢、長沙、西安、石家莊、濟南、南昌、澳門等地各高校從事倫理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五十餘人參加會議，《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應邀出席。

2017年11月27日，由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主辦的“首屆中國歷史文化論壇——中國文化史學術研討會”在澳門大學召開，來自澳門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蘇州大學、大連大學、湖南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四川師範大學、江蘇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五十餘位學者參與，共同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深刻解讀和探討。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主任、《南國學術》編委會主任郝雨凡致開幕辭，《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應邀出席。